

airiti

武裝衝突期間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 及其實踐：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影響*

郭雪真

陸軍官校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武裝衝突期間軍隊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角色，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訂有相關的義務及規範，但此義務或法律規範具體的落實則是有賴於國際組織與強國（主要是美國）在不同的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的實際經驗。即使美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已經規劃保護當地文化資產的措施，軍隊及其盟軍仍遭致批評未能保護文化資產。後續2004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未能保護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修道院及防止種族屠殺之間的兩難、2005年在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歷史1200年的清真寺螺旋塔遭到毀壞，以及2014～2015年「伊斯蘭國」蓄意毀滅古文明文物等案例，都呈現出聯合國、「北約組織」及歐美國家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更促使其在伊拉克戰爭後強化文化資產保護的認知及能力，以及建立更完善的文化資產保護制度。本文第一部分略述國際法有關武裝衝突期間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的規定，以理解軍隊的保護角色是國際法所賦予

* 本文曾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145-001-）經費補助，特此說明與感謝。

的責任與義務。第二部分說明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建立的文化資產保護措施，以理解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前的文化資產保護準備工作，以及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文物遭劫遭竊事件及其後續的影響。第三部分以2003年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後的三個案例，論述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第四部分探討伊拉克戰爭後國際組織與歐美國家為強化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認知與能力，建立相關政策與準則的措施。探索上述各項議題，藉以展現軍隊在戰前的規劃、戰時的防制及戰後的懲治，其保護文化資產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文化資產保護、武裝衝突法、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國際刑事法院

* * *

不久之後，我們將在歐洲大陸各地作戰，為保存我們的文明而戰。不可避免地，在我們前進的路上，將會發現歷史遺址及文化中心，這些象徵都向世界展現著我們正在作戰所保護的一切。無論何時，盡可能保護與尊重這些象徵，是每一位指揮官的責任。

-Dwight D. Eisenhower- (Merryman et al. 2007, 101)

如果反叛亂作戰的重心是人民，那他們的文化遺址是人民的良知，文化遺址通常作為他們族裔或宗教的試金石，或甚至是敵對族裔團體引爆衝突的熱點，以及他們社會具體可見的象徵。

-Dick Jackson- (2008, 47)

壹、前言

在國際武裝衝突期間，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是國際法律的要求，軍隊參與文化資產保護更是重要的角色，是預防性的保存（preventive conservation）人類文化資產（Kila 2013, 9-50）。國際法中國際人道法、武裝衝突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及國際私法都有軍隊保護與尊重文化資產的相

airiti

關條文，無論是涉案的個人或指揮官或政治決策者，違反者就涉及戰爭罪及侵害人權，都必須接受刑法處分。即使如此，人類的文化資產在戰爭期間仍然遭致蓄意或過失的重大破壞與毀滅，致使國際法律規範的實踐仍然必須建立在國際政治的現實基礎上。國際社會能否依據國際法規範在戰爭期間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端賴國際政治強國能否展現實力防止與制裁毀滅人類文化資產的國家或團體，國際法或國際刑法的執行是受限於國際政治的強國權力運作，尤其是其軍隊在此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在武裝衝突期間既要依據國際法規範保護文化資產，也要緝捕違反國際法破壞文化資產的行為者送交國際刑事法院審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對於武裝衝突中的文化資產保護逐漸成形，主要是以戰爭（武裝衝突）法或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觀點看待；1990年代後，更增加以國際人權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與國際刑法（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觀點看待，國際社會得以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起訴審判蓄意摧毀文化資產的國家及個人。尤其2003年伊拉克戰爭促使國際社會更積極看待軍隊在武裝衝突期間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不僅強化相關文化資產保護制度，也提升軍隊相關的教育訓練及準則。伊拉克戰爭後，2014年伊斯蘭國摧毀文化資產更促使國際社會思考面對非國家行為者或國際戰爭時，國際法能否依然適用非國家行為者，以及軍隊保護人類文化資產及懲治犯罪的角色。

本文嘗試從相關的國際法規定演變說明武裝衝突期間軍隊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角色是具有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的義務，但具體的實踐則是有賴於國際組織與強國（主要是美國）在不同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案例（主要是伊拉克戰爭）所呈現的實踐經驗，以及後續改善的相關法律、政策及制度。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區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略述國際法有關武裝衝突期間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的規定，以理解軍隊的保護角色是國際法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第二部分說明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建立的文化資產保護措施，以理解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前的文化資產保護準備工作，以及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文物遭劫遭竊事件及其後續的影響。第三部分論述2003年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後的三個案例，2004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未能保護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修道院及防止種族屠殺之間的兩難、2005年在伊拉克

薩馬拉 (Samarra) 歷史1200年的清真寺螺旋塔遭到毀壞，以及2014~2015年「伊斯蘭國」毀滅文化資產三項案例，論述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第四部分探討伊拉克戰爭後國際組織與歐美國家建立軍隊保護文化資產機制的措施，以強化軍隊的角色、認知與能力，藉以歸結軍隊保護人類文化資產及懲治犯罪的關鍵角色。

貳、武裝衝突期間文化資產保護的國際法規定—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

在國際武裝衝突期間及前後，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是國際法律明確的要求，軍隊參與文化資產保護更是重要的角色 (Kila and Herndon 2014, 116-123; Kila 2012)。有些國際法與國際公約條文內容規定，保護武裝衝突事件中的文化資產。¹ 例如國際武裝衝突法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的「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尊重陸戰法及慣例」 (1907 Hague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 of Customs of War on Land) (簡稱海牙第四公約) 附錄第27條規定，保護文化資產「使其不為軍事目的所用」。² 1935年，10個美洲國家簽署「保護藝術、科學機構及歷史紀念文物公約」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Historic Monuments)，使得文化資產保護以單一公約形式保護文化資產。比利時、西班牙、美國、希臘及荷蘭等國亦曾於1939年於國際聯盟提出「戰爭時期保護歷史紀念文物及藝術品之國際公約草案」 (Draf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nument and Works of Art in Time of War) (陳榮傳 2001, 503)。「1954年海牙保護武裝衝突事件中文化資產保護公約」 (以下簡稱「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s of Armed Conflict) 序言指出了公約的歷史傳承，「基於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約和1935年4月15日華盛頓條約所確立的關於在武裝衝突中保護文化財產的各項原

¹ 相關國際公約的演進及條文，參閱陳榮傳 (2001年)。

² Hague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 of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nnex art. 27, 18 Oct. 1907, 36 Stat. 2277.

則。」第3條及第4條規定要確保及尊重文化資產，防止在武裝衝突事件中遭受毀壞或損傷。³ 尤其第3-1條要求簽署此公約國家保護文化資產免於國家及國家軍隊的蓄意攻擊、意外損害、搶劫及偷竊。⁴ 國際刑法的「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1998）包含了個別罪犯違反文化資產保護罪刑的責任，國際刑事法庭可以起訴蓄意毀壞文化資產的個別罪犯（Hector 2010）。國際人權法的「1966年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第15條第1項第a款規定各締約國承認人人有權參與文化生活；並且依據此公約成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於2009年11月針對此條文發布「第21號一般評論」（General Comment No.21），其中指出在戰時或平時，各締約國有義務尊重與保護各種形式的文化遺產。⁵ 甚至國際私法規定可以就回復盜賊文化資產，提出國際訴訟（陳榮傳 2002, 67-128）。另外聯合國相關文化資產保護的公約，例如「1970年禁止與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資產及轉讓其所有權之方法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1970）第8條規定，各締約國對於任何人違反此公約第6條第b項及第7條第b項規定應施予刑罰及行政罰。「1972年有關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第4條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其領土內由本公約世界遺址清單（World Heritage List）所列的任何文化場址；第6條第3項規定各締約國不得採取蓄意措施直接或間接損害其他國家領土內受保護的文化場址。這些國際法與公約彰顯出人類文明進展過程中的理性，深知歷史文化資產是屬於全體人類，必須予以保護及防止受到戰爭或武裝衝突的破壞及毀滅。

³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s. 3, 4.

⁴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s. 3(1).

⁵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art. 15, para. 1a of the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1 December 2009, E/C.12/GC/21.

各國為遵守相關的國際法及公約，也制定國內法律與軍隊內部法規及教則，要求軍隊與軍人在武裝衝突或戰爭期間依據國際法與公約規定履行文化資產保護的責任。必須注意這些法律工具只能補充相關締約國的國內立法，它們不能凌駕國內法律。以下僅說明若干文化資產保護相關的國際法與國際公約重要條文內容，尤其是與軍隊尊敬與保護文化資產有關的條文。

一、「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

「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及其議定書（Protocol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第一議定書）是國際法上首先規範佔領時期的文化資產保護，但未能實際落實執行，尤其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及1991～1999年的前南斯拉夫內戰，毀滅了許多文化資產；遂在1999年3月26日通過了其第二議定書（Second Protocol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54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採取加強措施執行「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2004年3月9日生效實施。截至2019年1月，已有133個國家加入此公約（UNESCO 2019）。

（一）文化資產的保護與尊重：除軍事必要，必須適當措施保障文化資產

公約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承諾採用其所認為的適當措施，以便在平時準備保障在其領土內的文化資產，免受武裝衝突時可以預見的後果。」第4條第1項規定，「各締約國承諾尊重在其領土內的以及在其他締約國領土內的文化資產，不得為任何目的，而使用文化資產及其直接周圍或用以保護此項資產的設備。如果使用的目的可能在發生武裝衝突時，造成文化資產遭受毀滅或損失，就不得針對此項資產採取任何的敵對行為。」第2項規定，「第1項所述義務，只有在軍事迫切需要的情況下，始可放棄。」

公約第4條規定：「各締約國為尊重位於其領域內及其他締約國領域內之文化資產，就該文化資產及其直接周邊或為予以保護而設置之設施，於其使用可能致其於武裝衝突事件中毀滅或毀損者，即不得為之，並不得針對此等資產，採取任何敵對行為」；「前項義務，僅於絕對之軍事上必要時，始得免除之」。

公約第7條、第1條規定，各締約國承諾在平時將可以保證遵守本公約的各

項規定列入軍事規定或教則之中，並在其軍隊內培養一種尊重各國人民文化及文化資產的精神。第2條各締約國承諾在平時在其武裝部隊內設計、建立服務或專門人員，其目的在尊重文化資產並與負責保護文化資產的民政當局進行合作。

歸納上述規定，各締約國在武裝衝突期間只有在軍事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並採取適當保護措施，才能針對文化資產採取敵對行為，軍隊更要有尊重及保護文化資產的認知與素養。

（二）文化資產的特別保護：不得使用於軍事目的或鄰近易受攻擊目標

公約第8條對於數量有限與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專設特別保護規定，制定更加嚴苛的標準以禁止將文化資產或其鄰近區域用作軍事用途，以及針對文化資產實施敵對行為。這類特別保護的文化資產「不得使用於軍事目的」、要與易受攻擊的大工業區或重要軍事目標保持「適當的距離」，並且「應登記於『受特別保護之文化資產國際登記簿』」。賦予這類資產特別保護的軍隊或附近維持公共秩序的警察部隊，不視為使用於軍事目的，但若是軍隊或警察部隊配備攻擊武力或為挑釁行為，則就屬使用於軍事目的。

公約第9條規定：「各締約國應確保受特別保護之文化資產，自登記於國際登記簿時起，即免受針對該文化資產所為之任何敵對行為，……該文化資產或其周邊，均不使用於軍事目的。」

公約第11條規定，「各締約國就受特別保護之任何文化資產，違反第9條規定之義務時，其敵對國於其持續違反之期間內，得免除確保該文化資產免受攻擊之義務。但敵對國於可能時，應於合理期間內，先請求停止其違反行為」；「除本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外，受特別保護之文化資產之免受攻擊資格，其撤回以無法避免之軍事需要者為限，且以該需要持續之期間為限。此種需要之認定，僅得由指揮相當於師級或師級以上之部隊指揮官為之。撤回免受攻擊資格之決定，以情況許可時為限，應於合理之期限前，通知敵對國。」

歸結上述條文，各締約國不得以特別保護的文化資產為軍事目的或攻擊目標，敵對國可以要求停止此作為或免除不攻擊文化資產的義務；除非基於軍事需要並由師級部隊指揮官下令使得為之。

（三）文化資產的運送：國際監督及不得攻擊

公約第12條規定：「專為移動文化資產之運送，不問在一國領域內實施或運送至其他國家之領域，其實施得經相關之締約國之請求，依本公約施行規則規定之條件，受特別保護」；「受特別保護之運送，其實施應受前述施行規則規定之國際監督，並應彰顯第16條規定之識別標誌」；「締約國對受特別保護之運送，應克制不為任何敵對行為。」第13條規定：「締約國為特定文化資產之安全，認為有移動之必要，而其情勢緊急，無法依第12條所定之程序辦理者，尤其於武裝衝突開始時，以其未申請第12條之免受攻擊資格而被拒絕者為限，其運送得彰顯第16條之識別標誌。其運送應盡可能通知敵對國。將文化資產移往他國領域之運送，除經明示賦予免受攻擊資格者外，不得彰顯識別標誌」；「締約國於可能時，應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避免對本條第1項規定且彰顯識別標誌之運送，採取敵對行為。」第14條規定：「下列各項，均應賦予其免受攻擊資格，免被扣押、淪為戰利品或捕獲：1.受第12條或第13條規定之保護之文化資產；2.專供移動文化資產之運送工具」；「本條之規定，不得限制登臨及搜索之權利。」

歸結上述規定，各締約國移動或運送特別保護的文化資產必須通知敵對國及彰顯識別標誌，敵對國不得採取敵對行為，以特別保護文化資產不受攻擊。軍隊就必須認知此規定及識別標誌，不得攻擊文化資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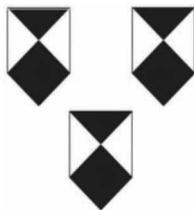
（四）文化資產的識別：藍色盾牌標誌與「藍盾委員會」

公約第16條對文化資產訂定一個三角並聯形式的藍色盾牌（BlueShield）的標誌，用以確認文化資產。



此藍色盾牌標誌僅用於不受特殊保護的文化資產，可以用在受強制保護的文化資產，同時也可以用於負責調查與保護的特定人員，文化資產的特定運

輪，並且充當執行海牙公約所界定規則的識別卡。若是三個藍色盾牌僅用於受到特別保護的非移動性文化資產，緊急狀況下的文化資產運輸，與臨時庇護所。



按照公約所訂之規則，武裝衝突期間受到特別保護之文化資產必須加以註記，並讓其可以受到國際的監督。更重要的是，武裝衝突期間，運輸受特別保護的文化資產的車輛，必須用此方式標記，必須在白天可以從空中與地面都能看見，負責保護文化資產的人員也必須配戴此標誌。

在1996年之前，並無特定的國際組織協調各國處理武裝衝突期間的文化資產事宜，僅能由各締約國自行處理。1996年遂由「國際檔案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與機構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共同組成「國際藍盾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8），2005年，「影音檔案協會協調會」（Coordinating Council of Audiovisual Archives Association）加入，協調各國的藍盾委員會共同合作保護文化資產與負責武裝衝突事件中的文化資產保護事宜；依據2006年海牙藍盾協議（2006 Hague Blue Shield Accord），各國的藍盾委員會於2008年共同組成「各國藍盾委員會聯合會」（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Committees of the Blue Shield 2018）；2016年，「國際藍盾委員會」與「各國藍盾委員會聯合會」合併為「藍盾國際委員會」（Blue Shield International）（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a）；至今（2019年1月），已有23國家藍盾委員會登記加入聯合會，另有23個國家

藍盾委員會正在成立之中（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b）。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協調與支持下，藍盾委員會平時協助各國相關教育及訓練，戰時協助交戰各方處理文化資產保護事宜，如同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ed Cross）協助處理難民、傷患及戰俘事宜。

（五）公約的適用：武裝衝突與佔領

公約第18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締約國兩方或兩方以上之間可能發生經宣告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衝突，即使一方或一方以上不承認有戰爭狀態」以及「對締約一方領土的一部或全部佔領，即使對於上述佔領不發生武裝抵抗」，即是公約適用於國際性武裝衝突。第19條第1項規定，「如果一締約國領土內發生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各衝突方應至少有義務適用本公約關於尊重文化資產的各項規定。」公約也適用於內戰或屬於國內武裝衝突性質的叛亂運動，各締約國在其領土內與特定的武裝團體（非國家主體）展開軍事行動，作為交戰方的武裝團體皆應遵守。簡言之，任何武裝衝突或佔領，任何武裝團體交戰都適用此公約，但恐怖主義組織或團體則不屬於國際性武裝衝突及國內叛亂團體，就不適用此公約。

二、「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第二議定書（1999年）

第二議定書在序言指出，各締約國意識到改善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資產的必要性和制定重點保護特別指定文化資產制度之必要性；重申1954年海牙公約條文的重要性，並強調有必要採取加強其執行的補充措施；希望建立適當的程序使各締約國能夠更密切地參與保護文化資產；認為保護文化資產的規則應當反映國際法的發展；確認國際法公認的準則繼續對本議定書所未能解決的問題行之有效。

第二議定書為改善公約執行成效，補充了許多條文，其中主要將原有的文化資產特別保護制度改為重點保護制度，並增加違反公約及議定書者的刑事責任及管轄權（Woudenberg and Lijnzaad 2010）。

（一）文化資產的重點保護

「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所定的特別保護制度執行成效不大，第二議定書創設重點保護制度強化執行成效。第10條規定置於重點保護之下的文

化資產，屬於對全人類具有最重大意義的文化遺產；國內有關法律和行政措施視為具有特殊的文化與歷史價值，並給予最高級別保護的文化資產；未被用於軍事目的或用以保護軍事設施，並且控制它的締約國已聲明確保它不會用於此類目的的文化資產。第12條規定，參與衝突的締約國應確保受重點保護的文化資產的豁免權，不把這些文化資產作為攻擊目標，不將這些文化資產或其周圍設施用以支持軍事行動。

（二）刑事責任與管轄權

不同於「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並未對違反公約者進行刑事懲罰，第二議定書第15條則規定，任何人不顧公約或本議定書之規定，故意做出將受重點保護的文化資產作為進攻目標；將受重點保護的文化資產或其周圍設施用以支持軍事行動；大量地破壞或攫取受保護的文化資產；將受保護的文化資產作為進攻目標；偷盜、掠奪或侵佔受保護的文化資產，以及對它們進行破壞的行為。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依據國內法對上述各種違約行為加以指控，並藉由適當刑罰制止此類行為。在指控與刑罰時，各締約國應遵守法律的一般原則和國際法，尤其是遵守把個人刑事責任擴大到直接行為者以外之其他人的規則。第16條就是規定各締約國的管轄權於發生在其領土範圍內、違反者為其國民，以及嫌疑人在其領土範圍內，但非締約國軍隊成員和國民則可不擔負個人刑事責任，但非締約國國民服役於締約國軍隊就必須擔負個人刑事責任。

第二議定書明定了以國內法與國際法懲治破壞文化資產的個人，確保文化資產保護的刑事管轄權與刑事責任，強化軍隊保護與尊重文化資產的責任與義務，奠定了當代保護武裝衝突期間文化資產的刑事法律基石。

三、「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簡稱羅馬規約）

在羅馬規約之前，聯合國是以設立「臨時戰犯法庭」審判違反國際武裝衝突法重罪的戰犯，其中重罪也包括破壞、毀滅及偷竊文化資產，例如「1993年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就在2002年以戰爭罪及危害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審判史初加爾（Pavle Strugar）將軍以火箭砲攻擊世界遺產場所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古城，2008年法庭依據「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規約」判決史初加爾將軍7年6個月徒刑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2017)。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有學者及國際組織提議設立國際刑事法院懲治戰爭、違反人道與人權的犯罪，直到1993年前南斯拉夫及1994年盧安達 (Ruwanda) 內戰發生種族屠殺滅絕事件，促使聯合國加速推動此提議 (林雍昇 2005)。199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羅馬規約，並於2002年4月達到60個批准國而於7月1日生效，預計2003年正式實施 (現已實施)。其主旨在常設國際刑事法院以懲治犯有種族屠殺和其他嚴重國際罪的個人，其中第8條有關戰爭罪的規定，特別指出嚴重違反國際法既定範圍內適用於國際武裝衝突的法規和慣例的其他行爲，例如「故意下令攻擊專用於宗教、教育、藝術、科學或慈善事業的建築物、歷史紀念物、醫院和傷病人員收容所，除非這些地方是軍事目標。」各締約國 (《羅馬規約》第12(3)條) 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羅馬規約》第13(2)條) 皆可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提交個人或國家違反情事文件，由檢察官調查或起訴，國際刑事法院審判及判決。但是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以及聯合國提供國際刑事法院的經費，必然會影響國際刑事法院運作，而影響其司法獨立性 (王怡 2005)。尤其是對於戰爭罪、種族滅絕罪、侵略罪、危害人類罪的界定是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互動結果，國際刑事法院可能政治化 (孫國祥 2002)。屬於破壞文化資產屬於戰爭罪範疇，但界定就不免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

遑論美國2000年簽署但至今仍未送交參議院批准，沒有承擔此規約的法律義務。2002年美國國會反而通過「美國軍人保護法」 (American 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s Act) 授權總統運用所有必要的方法保護美國軍人、民選官員與任命官員免於國際刑事法院起訴、拘留或拘禁；也禁止美國各級政府協助國際刑事法院，美國軍隊援助批准羅馬規約的國家，除非是「北約組織」成員國或非「北約組織」的美國盟國或是不將美國公民送交該法院的國家。⁶ 2003年，羅馬規約正式施行後，仍是需要另行設立國內法庭與國際重罪特別

⁶ *The American 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s Act of 2002*, Title 2 of Public Law 107-206.

法庭組成的混合法庭審判違反國際法重罪的個人（王保鍵 2015）。即使如此，國際刑事法院於2017年就首次以戰爭罪審判在馬利（Mali）國內武裝衝突中，多位摧毀文化資產的伊斯蘭教極端叛亂團體領導者（Jayaraman 2017），說明了國際刑事法院在懲治毀滅文化資產罪犯的功用。

根據上述各公約、議定書及規約條文規定，軍隊在國際性或非國際性武裝衝突都必須保護與尊重本國領土內及交戰國領土內的文化資產，不得以文化資產作為軍事目標。除非基於軍事必要性，而且該資產已成為對方設定的軍事防禦目標，否則軍隊是不得攻擊文化資產。故意違反者，得由該國或國際組織進行國內或國際刑法起訴、審判及懲罰。不僅如此，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國際法源不單以「戰爭法」（或國際人道法）探討武裝衝突期間軍隊的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因為文化資產是屬於當地國家的主權所擁有，戰爭期間交戰各方軍隊不能攻擊也要保護，戰後更要協助歸還。近來也有學者則是從「國際人權法」探討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也經不再是民族國家主權所擁有的資產，文化資產權已經演變成是人權的一種形式（Alderman 2013, 69-81）。簡言之，不再是以資產的架構而是以人權架構處理文化資產保護的議題。也就是探討國際文化遺產法律的人類層面，文化遺產是個人權利的客體（Francioni 2011, 9-16）。

聯合國「1948年人權普遍宣言」（也譯成世界人權宣言）（The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22條就說「每個人…，並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國際法學學者嘗試擴展文化資產的概念，認為文化遺產遺失損害到世界的集體文化，賦予國家主權更大的保護文化遺產之責任，損害文化遺產就是侵害人權（Alderman 2013, 69-81）。國際法逐漸是以文化資產與人權交織的議題來處理文化資產（Schairer 2001, 59-99），文化資產也涉及到國家繼承的問題，不能以國家主權之名隨意破壞（Jakubowski 2015）。尤其文化資產的保護涉及到「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相關條文，不能單獨以「國際人道法」或「戰爭法」處理。簡言之，文化資產已是個人權利，無論是戰時或平時，破壞文化資產就是侵害人權。

國際人道法（戰爭法）與國際人權法有其異同，都是保護人類生命及尊嚴，國際人道法（戰爭法）適用於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國際人權法則適用於任何時間（戰時及平時）（ICRC 2013）。然而，國際武裝衝突法的新趨勢除了訴諸於傳統的國際人道法及國際人道法慣例外，也出現訴諸於國際刑事法及國際人權法（Sivakumaran 2011, 219-264）。換言之，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是需要結合兩者的觀點，以及藉由國際刑事法庭或法院判決刑罰違反者，彰顯國際法重視文化資產保護，要求軍隊遵守規定保護或不破壞文化資產。這樣的結合論點尚未有定論，仍須依個案情形而定。

然而，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並非得以實踐在武裝衝突期間，尤其是推動相關國際法的美國及其盟軍，在面對敵對國家或團體蓄意破壞文化資產時，特別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其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就不免引起爭議與影響，也促使國際社會提升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認知與能力，以及建立更完善的武裝衝突期間文化資產保護制度。

參、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建立的文化資產保護措施經過

武裝衝突時，文化資產之所以受到攻擊，主要原因在於文化資產成爲交戰各方的戰爭目的或作戰訴求，或是以此獲取作戰的戰術優勢，或是藉以展現攻擊目標的承諾或提供作戰經費（Brosché et al. 2017）。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美軍就已有戰時文化資產保護的經驗。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避免人類文化資產受到破壞或毀滅，發展出軍隊保護文物的制度，並促使戰後國際社會發展出相關的文物保護公約。即使在規劃伊拉克戰爭之時，就已在民間團體呼籲與協助下，進行保護文化資產的準備工作；然而，戰爭期間伊拉克著名的文化資產仍遭致叛亂者攻擊而毀壞，美軍及其盟軍受到國際媒體批評未能善盡保護之責（Stone and Bajjaly 2008），甚至是無意保護或蓄意使其遭竊（Workert and Juby 2011）。遂有學者與美軍人員建議重新成立文化資產保護的專業人員及部隊負責（Alcala 2015, 206-254）。美軍也積極在其軍事準則、訓練與演習等方面發展與強化官兵的認知及能力。2015年6月12日，美國國防部法律顧問

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頒布「戰爭法手冊」（*Law of War Manual*）統攝各軍種相關的作戰準則，以彰顯美國國防部的整體立場觀點，作為美軍最新的戰爭法規範與教範；⁷ 其中第4.14條律定涉及文化資產保護相關軍人的責任，例如軍中負責文化資產保護的特殊人員、獲得授權武裝護衛文化資產的人員，以及監督1954年日內瓦文化資產公約執行的人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參戰國家任命的文化資產保護代表、盟軍代表、文化資產委員會主席，以及此委員會提議的檢查官與專家）（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138-142）；第5.18條律定敵對期間對於文化資產的保護（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268-286）；第11.19條律定佔領期間對於文化資產的保護（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790-792）；第17.11條律定非國際性武裝衝突期間對於文化資產的保護（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1029-1030）。彰顯出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所學習到的文化資產保護經驗，正逐漸具體呈現在其軍事準則、訓練與演習之上（如後述）。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經驗

美國建立戰爭期間的文化資產保護制度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藝術學者關切歐洲戰場中文化資產受到德國納粹軍隊掠奪與破壞，以及擔心美國軍隊軍事行動破壞毀損歐洲文化資產而呼籲美國政府建立文化資產保護制度，負責追蹤與歸還德國所掠奪的文化資產，以及限制軍事攻擊對文化資產的破壞及毀損。戰後，更促使各國簽署「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但美國直到2009年才正式簽署），使得武裝衝突期間的文化資產保護成為各國的國際法義務。

在1942年，哈佛大學「佛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的史濤（George Stout）提出了戰爭時期歐洲易受戰爭破壞的文化場所的問題，並且在1943年1月，「美國學習社會理事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與「哈佛美國國防小組」（Harvard American Defense Group）

⁷ 該手冊條文厚達1176頁，並於2016年5月31日修正更新，仍是厚達1166頁。

成立委員會討論此議題。此委員會由著名的知識分子所組成，諸如哥倫比亞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總裁丁斯穆爾（William Dinsmoor），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的泰勒（Francis Henry Taylor）、「國家畫廊」（The National Gallery）的芬雷（David Finley），以及哈佛大學的沙奇斯（Paul Sachs）。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於1943年8月20日設立了「美國保護與拯救戰爭地區藝術紀念物與歷史紀念物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並任命丁斯穆爾及最高法院羅伯斯（Owen Roberts）大法官領導該委員會，以回應這些學者及藝術學者的呼籲及要求，此委員會也被簡稱「羅伯斯委員會」（Roberts Commission）。委員會推薦具有相關領域專業的軍官，作為戰場指揮官的文化資產顧問，提供相關文化資產資訊與建議，例如委員會與「遺產、藝術品及檔案組」製作的「受保護的遺產清單」（Lists of Protected Monuments）以確保指揮官能將文化資產保護與歸回納入作戰計畫之中（Sandholtz 2007, 146-148）。

然後，美國政府戰爭部（即後來的國防部）接受「羅伯斯委員會」建議在各戰區盟軍總部的「民事軍政府組」（Civil Affair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Section）成立了「紀念物、藝術及文件檔案服務組」（The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Section, MFA&A），組內人員多是學者、建築師、雕刻家、畫家及博物館館長，負責限制戰爭對文化物品及場所的損壞，以及歸還在軍事活動期間中找到文物。美軍開始以「羅伯斯委員會」發展的「受保護的遺產清單」開始，並由「哈佛美國國防小組」運用《貝迪克旅遊導覽》（*Baedeker travel guides*）及「義大利旅遊俱樂部」（the Touring Club Italiano）出版24冊的《義大利導覽》（*Guida d'Italia*）補充資訊（Hartt 1949, 5）。每個清單涵蓋了兩個或三個地區，以及保護文化資產的軍事命令。當軍隊移動到作戰區域時，這些清單使得軍人在戰場上可以迅速地發現、確認及記錄文化遺產、藝術品及文化資產收藏品，以及找到當地文化遺產專業人員，以及與他們合作夥伴關係。除了軍事命令外，當時歐洲戰區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更附上個人信函呼籲各級指揮官尊重現代世界的藝術遺產，以彰顯美軍的聲譽（Lambourne

2001, 124)。

在1943年9月，進攻義大利之前，「紀念物、藝術及文件檔案服務組」的軍官就派遣在軍隊之中，並且成功地減少軍事活動對義大利藝術寶物的損壞。例如「紀念物、藝術及文件檔案服務組」成員說服盟軍指揮官避免在佛羅倫斯（Florence）城內作戰。在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第時「紀念物、藝術及文件檔案服務組」人員也出現了，以確保文化寶物會受到護衛與保護。在杜魯門總統的指示下，美國將這些文化寶物送回這些文物原有的國家。戰後，美國佔領德國期間的最高軍事首長（military governor）克雷（Lucius Clay）將軍負責儲藏德國藝術寶物。當美國第三軍人員拯救了Kaiser Friedrich的部分收藏品時，包括從德國梅克爾斯（Merkers）鹽礦區找到的10件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作品。克雷將這些收藏品裝船送回美國，並儲藏在美國的「國家藝廊」；他並阻止國會議員將這些畫作充當為戰爭賠款。1950年，美國政府將所有藝術品歸還德國柏林，這些作品成為「普魯士國家收藏品」（Prussian State Collection）的一部分。克雷曾說：也許在世界歷史中，從未曾有過一個征服國家的軍隊不是為了自己，而忠誠地保存其他國家的寶物（Arndt 2005, 245）。1946年6月30日，「羅伯斯委員會」裁撤，而由國務院國際暨文化事務處（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接續後續的佔領區文化資產保護工作（National Archives 2017）。

美國及其盟國是具有較完善保護武裝衝突期間文化資產的制度與經驗，並以推動及遵守相關的國際法及公約為榮譽與責任。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發生之前，即有民間團體協調政府單位（國務院及國防部）中，在戰前做好保護伊拉克宗教場所及文化場所的準備工作，但仍然發生民衆偷竊及掠奪文化資產的事件，致使國際新聞媒體及學者批評美國及其盟國未能善盡保護之責任。

二、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的準備工作

2001年2月26日，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政府炸毀巴米揚大佛（Buddhas of Bamyān），引起國際社會輿論譁然，認為塔利班政府是文化恐怖主義，但即使聯合國派特使表達關切及尋求制裁，依然無法阻止其後續完全炸毀

(Francioni and Lenzerini 2003)。就在美國傳聞將要出兵伊拉克前，2002年11月29日，美國「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主席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及「美國文化政策協會」(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Cultural Policy)主席霍金斯(Ashton Hawkins)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表了一篇名為「保存伊拉克的過去」(preserving Iraq's past)的專欄文章，呼籲美國領導者進行有系統的、政府層級的規劃，以保護伊拉克宗教場所及文化場所；因為伊拉克的土地是古時候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所在，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搖籃，不僅僅是伊拉克的文化遺產，而是全世界的文化遺產，不僅要保護也要防止掠奪及毀壞(Anderson and Hawkins 2002)。不久之後，2003年1月24日，安德森、霍金森及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教授也是近東考古學的專家吉布森(McGuire Gibson)，他們與國防部負責「維持穩定作戰行動」(stability operation)⁸的副助理部長寇林斯(Joseph J. Collins)及其三位幕僚在國防部會面，國防部官員表示他們已經有相關的計畫，包括當地「文化及考古學場所名單」；安德森和霍金森又拜會了國務院及提報相同的簡報，國務院官員似乎較為協調於面對伊拉克文化遺產的威脅，但他們採取行動的能力受到國防部負責領導所有伊拉克作戰規劃的事實之限制。雙方一致認為，國防部嚴密控制戰前規劃的支配權，而且並未成功地整合政府文職機構的工作在戰爭規劃之中(Cogbill 2008, 31-32)。

吉布森則與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作戰暨環境分析處」(Oper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 Division)處長考特斯(John J. Kautz)開會，提供了更多關於考古學挖掘位置的訊息，以確保作戰目標規畫者能區別出在影像上考古學挖掘場所與防空砲兵挖掘的陣地，並將文化場所名單成功地納入軍事規劃者的「禁止攻擊清單」(no-strike lists)或「禁止射擊地區」(no-fire areas)。的確，美軍「聯合直攻彈藥」(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s)並沒有攻擊到任何的文化資產或場所(Cogbill

⁸ 「維持穩定作戰行動」是指美國軍隊與政府其他部門在海外合作維持或重建安定安全的環境，提供基本的政府服務、緊急基礎建設重建及人道救援(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2008, 32)。2003年1月，國防部就正要開始設立「重建暨人道援助辦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RHA)，負責整合文職機構能力納入戰後規劃。前任國防部政策次長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費茲 (Douglas J. Feith) 與國家安全顧問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黑德雷 (Stephen Hadley) 共同為「重建暨人道援助辦公室」撰寫了組織章程，費茲認為美國政府需要有一個永久的機制來將民間機構能力整合納入軍事作戰行動之中。同樣地，戰爭期間避免毀壞文化遺產場所，端賴將保護這些文化遺產場所的規劃予以制度化 (Cogbill 2008, 32)。由於「重建暨人道援助辦公室」沒有經驗及沒有效率，該辦公室未曾與負責「維持穩定作戰行動」的「美軍中央作戰司令部」(Central Command) 妥善整合，致使「重建暨人道援助辦公室」在3月下旬寄了封信函給美軍資深官員警告伊拉克國家博物館的威脅，這封信函指出在伊拉克國家銀行之後，國家博物館是排名第二需要保護的場所 (Martin et al. 2003)。

不幸地，稍後的事件清楚地彰顯軍隊指揮官並未注意到這封信函的警告。當美軍主要兵力在2003年4月7日進入巴格達市中心之前，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就遭受掠奪與偷竊了 (Bogdanos 2005; Rothfield 2008)。因為美國在巴格達的部隊已經命令要確保總統宮殿及可能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場所之安全，但沒有特別命令要確保文化場所的安全 (Lawler 2003, 582)，遂爆發震驚世人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

三、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文物遭掠奪與盜竊事件

2003年4月10日，就在巴格達已經落入美軍控制，伊拉克民衆與美國軍人合力用鋼索拉倒巴格達菲爾達斯廣場 (Firdaus Square) 海珊 (Saddam Hussein) 雕像的一天之後，少數伊拉克暴民搶奪了伊拉克的國家博物館。他們利用伊拉克國家安全機構與治安單位快速瓦解及隨後的混亂狀況，為所欲為掠奪及偷竊館藏文物。在沒有美軍明顯干預下，至少有1萬5千件代表伊拉克文化遺產的無價寶物及重要物品，被帶走了 (Willis 2005, 221-251)。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失竊的文物，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之始，此事件毀了盟軍的聲譽 (Bogdanos 2008)。即使盟軍未能保護該博物館文物，但也不能免除盟

軍保護文化資產的國際法義務（Sandholtz 2005, 185-240）。

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搶劫案受到國際新聞媒體廣泛的關注，這些遭搶失竊的文物反映著古代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谷（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River Valleys）的歷史（Bogdanos 2005, 15, 270-271）。在保護文化資產免於搶劫上，1954年海牙公約要求軍隊：(1)在進行軍事行動時，避免偷竊或搶奪；以及(2)在佔領時，盡可能支持適任的被佔領的當地國家當局確保及保存其文化資產。⁹

國際新聞媒體、其他國家與學者，都認為美國軍隊不會涉及1954年海牙公約「第一號通令」（General Order Number 1）所特別禁止掠奪當地文化資產的行為。¹⁰ 依據美軍準則規定，美軍應該擔負「盡可能，支持適任的被佔領的當地國家當局」之義務，但並未指派「適任的當地國家當局」，直到建立了佔領，因為這需要「克服有組織的抵抗活動，以及擁有的軍隊必須已經採取措施建立其權威。」（U.S. Department of Army 1956）而且直到今日仍有爭論美國軍隊何時建立有效控制博物館附近的巴格達區域，這觸發了佔領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與責任（Bogdanos 2005, 205-211; Johnson 2006, 149-152）。然而，在主要戰鬥任務及佔領之間的混亂時期，美軍及其盟軍並沒有防止掠奪文化資產的法律義務。波格丹諾斯（Matthew Bogdanos）及喬森（John C. Johnson）正確地歸結出美國軍隊應該提供保護這間博物館，並且差點協助伊拉克當局（Bogdanos 2005, 211; Johnson 2006, 152）。這也許會或也許不會防止這悲劇的產生；然而，從「伊拉克自由作戰行動」（Operations Iraqi Freedom）中獲取的教訓是美軍未能適當地規劃「維持穩定作戰行動」計畫，即使在作戰行動的戰鬥階段。

在「伊拉克自由作戰行動」及「持續自由作戰行動」（Enduring Freedom Operation）期間，並無美軍蓄意以文化場所為作戰目標的報告，美軍中央作戰司令部下令禁止掠奪這國家的文化場所或移動遷移文化資產，並以「接戰準則」（Rule of Engagement）方式製作成隨身卡片發送官兵遵守（Center for

⁹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 4(1).

¹⁰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 4(2).

Law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2004, 376-377)。盟軍的措施是要保護人類文化資產免於戰爭的破壞，這意味著在「伊拉克自由作戰行動」期間，當有組織的抵抗活動結束後，美軍就有法律義務恢復秩序及防止偷竊。「後衝突作戰行動」(post-conflict operation)¹¹ 或「維持穩定作戰行動」之後，挑戰了當前國際社會的文化資產保護制度，也相對要求在軍事佔領期間協助「適任的國家當局」「確保及維護其文化資產」(Johnson 2006, 111-152)，例如爭論那個國家應該為遺失的伊拉克文物負責 (Bejesky 2015, 397-468)？但當「軍事佔領」開始的時機及其援助「適任的國家當局」的程度是受到國際法的規定？保護文化資產及限制其使用的軍事義務有例外？如果這情況在聯合國制裁某國的盟軍作戰行動期間發生，那這些作戰行動中的法律義務是什麼？它們是來自戰爭法或國際人權（人道）法？所有的盟軍部隊夥伴都能使用致命的武力防衛文化資產？如果法律義務不清楚的話，美軍發展中的「反叛亂作戰行動」(counterinsurgency) 及「維持穩定作戰行動」準則要求軍隊保護文化資產，因為文化資產像是當地國家認同的基本元素，並且也像是當地遭受各種作戰摧殘的人民之良知。

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致使美軍原先的文化資產保護成就瞬間遭受到國際與國內媒體批評，乃至美國國會議員的指責。為了回應國際媒體，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梅爾斯 (Richard Myers) 將軍說，「這件事就像其他事一樣有輕重緩急。」根據梅爾斯的說法，壓制現在敵人戰鬥行動的需要是凌駕於保護博物館的需要 (Jehl and Becker 2003)。倫斯斐部長則是反應：壞事總會無故發生 (stuff happens) (Loughlin 2003)。這樣的回應彰顯出美軍在作戰計畫中，只是考量到依據國際法規定不要攻擊文化資產場所，並未關注到軍事佔領前後也是需要履行保護文化資產的責任。2003年4月16日，美軍派遣一個戰車排到國家博物館並設立警衛，防止再度發生掠奪及偷竊事件。不久之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波格丹諾斯 (Matthew Bogdanos) 上校（原為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回役）帶領一組由聯邦調查局、移民暨海關署及紐約市警察局代表組成的「聯

¹¹ 後衝突作戰行動是指在軍事行動之後，協助當地政府重建恢復秩序及提供和平安全的環境，使民衆能恢復正常穩定的生活。

合部會協調小組」到博物館，開始進行官方調查文物掠奪，並且開始找回失去文物的過程（Bogdanos 2005）。雖是為時已晚，但有做總比沒有做好。歷經多年努力，該小組追回與修復不少遭竊的文物，波格丹諾斯因此獲頒2015年「國家人道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s）。他也提醒美國政府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應該組織專責保護文化資產的單位，海外駐軍也需要接受文化認知訓練（Bogdanos 2007）。

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所發生的文化資產遭受破壞毀滅的事件，尚未完全獲得妥善處置之際，接連又發生破壞文化資產的案例，更促使國際組織與歐美國家強化軍隊在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及作用。

肆、伊拉克戰爭後的軍隊保護文化資產實踐案例

伊拉克戰爭結束後，戰爭期間的文化資產保護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美軍及其盟軍在後續三個作戰行動中的作為，以及「伊斯蘭國」蓄意毀滅巴比倫古文明文物，引發國際社會關切文化資產的重要性：2004年在科索沃保護東正教修道院（Serbenko 2005, 91-125）、2005年在伊拉克薩馬拉歷史1200年的清真寺螺旋塔遭到毀壞（Corn 2005, 28-40），以及2014~2015年「伊斯蘭國」蓄意毀滅古文明文物（He 2015, 168-190）。相較於2003年伊拉克戰爭，這三個案例是無法事先規劃及預防，在此當中，歐美國家的軍隊被賦予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期望與責任，有成功也有失敗，值得從不同觀點的角度探討與分析軍隊在個案中的關鍵角色。

一、科索沃「天使修道院」事件—國家政策決定軍隊使用武力

文化資產受到國際法律條約保護，但毀壞文化資產與宗教資產在科索沃並沒有停止。2004年科索沃裔阿爾巴尼亞人由於受挫於其作為國家的最終地位之政治解決方案沒有進展，在科索沃全國進行報復性族裔屠殺塞爾維亞飛地內的人民及破壞宗教場所（Bouckaert 2004）。在2004年產生的暴動中，幾處宗教場所，包括在普里茲倫（Prizren）古城的第14世紀「天使修道院」被憤怒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群眾所摧毀（Nyheter 2007）。鮑克爾特（Peter

Bouckaert) 指出，在與北約組織法律顧問討論保護文化資產的義務中，非常明顯地「國家特許狀」(national caveats)¹² 阻止了軍隊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使用致命武力保護文化資產；在文化資產保護上，國際人權法先於戰爭法。但有些國家的分遣部隊受到「歐洲人權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第2條的限制，該條文保護「生命權」(right to life)，絕不使用致命武力保護文化資產，即使這資產被佔據了。¹³ 在2004年各項暴動期間的幾個場合，「北約組織」各分遣部隊遵守其自己國家的政策指示，撤離塞爾維亞飛地及宗教場所而不是以致命武力保護這些文化資產(Bouckaert 2004)。北約軍隊撤離隱含著其縱容族裔屠殺，這正是其所要防止的。然而，義大利分遣部隊則努力保護位於迪卡尼(Decani)古城的14世紀修道院，並誓言不撤離陣地，並保護修道士的生命及這珍貴的文化資產(2004年該修道院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場所)(Serbenko 2005, 95)。北約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是受到各國政策決定，並不是依據國際法的要求或義務。

對於北約國家軍隊執行聯合國制裁的作戰行動而言，涉及國際法的國家責任爭議也許可以藉由「歐洲人權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007年的判例來解決。在比哈瑞尼(Behrami)案例(Behrami and Behrami v. France)¹⁴ 及沙拉馬提(Saramati)案例(Saramati v. France, Germany and Norway)¹⁵ 中，歐洲法院大法庭(the Grand Chamber)的法官判決不予受理

¹² 國家特許狀是指「北約組織」成員國家對於其參加多國安全任務部隊的本國軍隊及文職單位設定使用武力的限制，例如禁止使用致命武力保護文化資產、戰場接戰、進入敵對地區等等。

¹³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Nov. 4, 1950, 213 U.N.T.S. 221.

¹⁴ 2007年比哈瑞尼(Behrami)判例是1999年「北約組織」出兵科索沃，北約盟軍空軍以集束炸彈轟炸米垂歐維卡(Mitrovica)市區，但地面上有數枚未爆彈，北約盟軍地面部隊(由法軍主導)數月並未處裡，直到2000年3月有8位阿爾巴尼亞孩童在附近嬉戲，其中一位將未爆彈丟向空中突然爆炸，造成比哈瑞尼(Agim Behrami)的兒子畢克爾(Bekir Behrami)及格達夫(Gadaf Behrami)分別重傷及死亡，因為法國軍隊未能標示或拆除未爆彈所致，比哈瑞尼和畢克爾遂控告法國政府。

¹⁵ 2007年Saramati判例是2001年4月，聯合國駐科索沃臨時行政任務當局(United Nations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警察逮捕沙拉馬提(Saramati)控告他涉嫌非法擁有武器及意圖謀殺，他主張受到非法延長拘禁及侵害其法院受審權利，經法院審

原告控訴聯合國科索沃任務部隊（the UN Mission in Kosovo, UNMIK）法、德、挪威三國的軍事行動造成其傷害，因為該部隊是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組成，合法有權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制裁行動決議（1999年第1244號），無論是拆除未爆彈或拘禁嫌犯都屬於其任務範圍，並不受「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的限制（Farrior 2007, 473-475）。

簡言之，聯合國科索沃任務部隊服從聯合國指揮，並且代表聯合國執行和平作戰行動，而不是歐洲國家在執行，不受「歐洲人權公約」之限制。但是若造成當地人民傷亡，就要受到「歐洲人權公約」規範及「歐洲人權法院」審判，致使各國軍隊執行聯合國制裁行動及維和行動日漸趨向依據戰爭法採取文化資產保護行動，這彰顯出在未來的這類任務行動中，軍隊適用以戰爭法（「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而非國際人權法為基礎的標準來保護戰爭期間的文化資產。因為若是軍隊或軍人使用致命武力保護文化資產致使當地人民傷亡，就涉及到歐洲人權法院審判，更會促使各國政府與軍隊思考是否依據國際法或依據哪個國際法（戰爭法或人權法）執行保護文化資產任務，端賴各國政府的政策指示軍隊而定，尤其是制定軍隊使用武力的限制條件，以避免使本國軍人受到「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權法院」的審判。

二、伊拉克薩馬拉螺旋塔事件-軍事必要性的判定

2004~2005年美軍指揮官在歷史悠久的薩馬拉清真寺螺旋尖塔上安置狙擊手，是一項戰術選擇，以監控當地的關鍵區域，特別是在已經成為不斷受到叛亂份子攻擊的路口（Corn 2005, 40）；同時也是佔領部隊有義務要為當地人民提供安全使其免於恐怖份子攻擊。即使適用最嚴厲的「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第4條第1項規定，要求國家「避免使用文化資產或其鄰近的周

判判決其拘禁逾期而釋放。7月，他接獲警方電話通知前往領回其物品，途中路經聯合國駐科索沃安全部隊（由德軍主導）。數日之後，警察奉該部隊挪威指揮官命令逮捕及拘禁他，指揮官並下令兩次延長拘禁達60天，直到2002年1月地方法院判決其意圖謀殺，並從聯合國駐科索沃安全部隊轉送聯合國駐科索沃臨時行政任務當局監禁，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及下令更審與釋放他。

遭環境……這可能使其在武裝衝突中遭致毀壞或毀損。」¹⁶「允許在軍事必要性下擱置這些義務」¹⁷ 難以主張基於迫切的軍事必要性而佔領該地的戰術指揮官，爲了提供當地民衆安全，不會超越第4條第1項的義務。¹⁸ 即使如此，該塔容易成爲叛軍攻擊的目標，以及美軍人員往返哨所造成防禦間隙，經新聞媒體報導之後，2005年3月美軍狙擊手撤離尖塔；2006年4月，當地叛亂份子就引爆炸彈毀壞了尖塔部分的頂部（Corn 2005, 28-40）。彰顯出在判定軍事必要性的迫切與否上，指揮官並沒有決定權，而是受到輿論及政治的影響。

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伊拉克政府簽訂協議修復此塔，至今仍未修復完成。但若是完全理解反叛亂作戰行動戰術及伊拉克遺產紀念物的重要性，也許就會有不同的結果了。在法律上，軍事狙擊手使用清真寺尖塔是被允許的；但在美軍政策及反叛亂作戰戰術上，若是因此造成毀壞清真寺尖塔則就與美國利益相反的，美國的利益是要建立穩定的伊拉克，保護其骨董文物免於損壞及尊重古代宗教場所的神聖性。明顯呈現出國際法要求美國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責任是否能實踐，這是要端賴美國外交政策及軍事作戰行動任務考量而定，並非基於考量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國際法責任。

簡言之，美國軍隊撤離重要的軍事制高點不是基於國際法保護文化產的義務，而是基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考量，但卻也造成文化資產的毀滅與毀損，顯見軍隊的作戰行動決策的影響甚鉅。

三、2014～2015年「伊斯蘭國」毀壞古文物事件—非國家違法者與盟軍武力

軍隊在戰爭期間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至爲重要，究竟是要服從國際法的規範擔負起保護責任，抑或是體認當時的政治情勢而採取權宜措施？尤其是2014～2015年伊斯蘭國毀滅人類古文化資產所引發的國際法適用爭議，面對非國家行爲者的恐怖組織團體，軍隊又要如何擔負起保護文化資產的國際法責

¹⁶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 4(1).

¹⁷ 1954 Hague Convention, art. 4(2).

¹⁸ Hague IV, art. 43.

任。在目前的敘利亞內戰期間，該國與伊拉克國家遺產史蹟場所遭到砲擊，包括十字軍（Crusaders）建立的「騎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要塞，以及城堡、清真寺、教堂及墳墓等，都已經遭受到「伊斯蘭國」破壞（Cunliffe 2012）。由於美軍及其盟軍並未出動地面部隊攻擊「伊斯蘭國」佔領區，而採取空中轟炸攻擊方式，企圖阻止「伊斯蘭國」佔領區愈擴大，但仍無法阻止其在佔領區內任意破壞巴比倫時期的文物、建築等等（Polgreen 2013），加上伊拉克與敘利亞政府無力擊退「伊斯蘭國」及保護文化資產，另外「伊斯蘭國」並非國家，不屬於國際法與公約所規範的對象，人類文化資產不免繼續會遭受破壞及毀滅，需要重新修改國際法律及公約，以及提早防衛會遭遇破壞與毀滅的文物遺址（He 2015, 179-190）。無論如何，都必須儘速由聯合國或強國軍隊協助伊拉克與敘利亞政府擊潰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即早收復失地，才是保護當地文化資產不受伊斯蘭國破壞的最有效方法。

2014年7月，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摧毀了伊拉克北部摩蘇爾市（Mosul）的先知攸納斯（Yunus (Jonah)）墓園；2016年10月，伊拉克軍隊就在英美提供空中轟炸攻擊及部分地面部隊協助，以及當地民兵部隊聯合攻擊摩蘇爾市的伊斯蘭國部隊；2017年1月，伊拉克軍隊收復該城市，墓園已是殘破不堪（MailOnline 2017）；7月，伊斯蘭國部隊潰逃，伊拉克軍隊完全控制該城市（BBC News 2017）。伊斯蘭國將摧毀古代文化資產不僅視為是展示意識形態，也是一種（心理）戰爭武器（Turku 2017a），意圖以「文化滅絕」（cultural cleansing）摧毀人類普遍價值觀，作為動搖民心及削弱社會防禦的戰術（Bokova 2015）。對人類文化資產而言，更是「文化大屠殺」（cultural genocide）。即使聯合國秘書長在2015年就聲稱伊斯蘭國在摩蘇爾市摧毀文化資產的行為已經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199（2015）號決議，屬於犯下戰爭罪的行為。但此決議主要是指依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伊斯蘭國的恐怖行為是危害國際安全和平的威脅，強調以金融手段對抗恐怖主義，包括阻止伊斯蘭國走私盜賣敘利亞及伊拉克文化資產（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15）。反而是美軍與其盟軍在轟炸時，必須迴避與保護「文化資產保護名單」（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Lists）所列的文化資產而造成較佳的戰略溝通。誠如考古學家Rush（2012, 41）的審慎告誡：「在不熟悉的（作戰）環

境部署的人員必須了解是當地社區的成員應該將其地景上的文化資產賦予價值。」

彰顯出伊斯蘭國可以隨意恐怖攻擊文化資產或以文化資產為軍事設施，美軍及其盟軍卻必須保護文化資產及不得攻擊文化資產附近的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伊斯蘭國毀壞古文物事件引發國際法「適任的國家當局」「確保及維護其文化資產」適用，延伸至戰爭法、國際人道法及國際人權法，以及以國際刑法審判的議題，彰顯出伊斯蘭國事件的重要性與影響。

恐怖組織是一般犯罪團體或是交戰團體，是否適用戰爭法或武裝衝突法（葉錦鴻、林正順 2007）。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翰丹控告倫斯斐（*Hamdan v. Rumsfeld*）判決，武裝衝突法僅適用於國際武裝衝突或內戰，指涉的是國家之間或內部的武裝衝突，美國與基地組織（al-Qaeda）的武裝衝突不適用武裝衝突法，因為基地組織是恐怖組織而不是國家。¹⁹ 由此可知，伊斯蘭國也不是國家，也就無法適用武裝衝突法或戰爭法，但適用於國際人道法或國際法慣例。伊斯蘭國並非主權國家，雖不受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及相關國際法的限制，而且伊斯蘭國在當地的武裝衝突是屬於國際武裝衝突還是國內衝突或叛亂或內戰，加上其本質屬於極端暴力的恐怖組織，以恐怖攻擊的方式及徹底毀滅古文明文化資產（The Guardian 2014; 2015b），甚至非法走私文化資產獲取財務，使國際法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檢視既有國際法的政治現實面。例如鮑偉斯（Pauwels 2015, 64-70）呼籲國際社會必須介入與阻止伊斯蘭國非法走私文化資產，不僅是違反國際文化資產保護法，更重要的是其藉此獲取經費擴展其組織勢力及從事恐怖行動。奎格雷（Quigley 2015）則依據國際人道法認為伊斯蘭國毀滅古文化資產是犯了戰爭罪，無論其是否簽署國際法或是主權國家。友松和喬德荷瑞（Arimatsu and Choudhury 2015, 641-968）則是訴諸於伊拉克及敘利亞應該依據國際法履行保護文化資產的責任，以及以戰爭罪處置伊斯蘭國恐怖分子。

無論如何，伊斯蘭國及其他激進的恐怖主義團體蓄意破壞文化資產已經促使法國、義大利及英國將此視為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威脅之一，不僅研擬

¹⁹ *Hamdan v. Rumsfeld*, 548 U.S. 557, 630 (2006).

制定或修訂國際法或國內法及相關政策，也更強化國家主導、軍民合作的多重保護文化資產的措施（Foradori, Giusti and Lamonica 2018）。直到2017年，國際刑事法院首次以違反羅馬規約第8(2)(e)(iv)條的戰爭罪逮捕、起訴及審判多位在馬利武裝衝突中摧毀文化資產的伊斯蘭教極端叛亂團體領導者，其中馬諦（Al Mahdi）判刑9年（Jayaraman 2017）。該叛亂團體曾在2012年間控制近三分之二的馬利領土，並多次與政府軍交戰，直到2013年，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法國組織多國部隊出兵協助政府軍對叛軍作戰，重新取回對當地的控制權。由此推論，聯合國仍會以此方式處理伊斯蘭國的摧毀文化資產的罪行，此罪行不僅違反文化資產保護，也違反了人民所保護的文化價值（Gerstenblith 2016, 336-393）。即使目前伊斯蘭國漸漸衰敗，不僅要憂慮其是否以摧毀當地文化資產為報復外，也要以國際刑法追緝摧毀文化資產的相關人員繩之於法，藉以嚇阻防止後續的摧毀。尤其是需要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出兵決議，派遣軍隊前往平定叛亂，緝捕破壞文化資產的罪犯，送交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及危害人道罪起訴及審判。前者主要是適用在武裝衝突期間，後者則是適用於承平時期的起訴審判的法律基礎。但馬諦案例說明了兩者都可以用以起訴及審判破壞文化資產的罪犯，不論是國家或非國家、團體或個人。但最重要關鍵在於能否緝捕到罪犯，此時軍隊的關鍵作用就更明顯了。

簡言之，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學者大都理解唯有以武力擊退伊斯蘭國離開佔領區，並將毀滅文化資產的恐怖分子以戰爭罪論處，才能有效執行國際文化資產保護相關法律的要求。2016~2017年就是在國際強國（美國、英國、法國及俄羅斯）以空中攻擊及少數地面部隊協助伊拉克及敘利亞的軍隊進行地面攻擊收復失土（例如摩蘇爾市），擊潰伊斯蘭國及追捕相關領導者。聯合國如此才能依據國際法起訴及審判伊斯蘭國領導者及成員，毀滅與走私古文化資產的罪行。

伍、伊拉克戰後歐美國家建立的軍隊保護文化資產措施

由於伊拉克戰爭及後續幾場武裝衝突中，古文物資產遭受破壞及偷竊的影響，國際組織及歐美國家重新建立及改善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措施。「聯

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分別於2003年4月17日在巴黎、4月29日在倫敦、以及8月1日在東京等地，邀集國際文化資產專家參加維護伊拉克文化遺產的會議，並根據會議結論所作成的計畫執行。在聯合國及相關國家協助之下，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於2015年2月28日重新開幕(UN News Centre 2015)。在此期間，歐美國家配合「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計畫建立及提升強化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認知與能力，包括組織、法令、教育訓練及軍事準則。

一、美國政府與軍隊

由於受到此事件的影響及上述「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的要求，美國國務院於2004年8月15日成立「重建暨穩定協調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負責總統交付的協調與領導所有準備、規劃及執行穩定及重建活動；並於2005年獲國會授權成立「文職後備軍人團」(the Civilian Reserve Corps) (以美國の後備軍人為基礎) 將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文人專業技能成為其資本。該辦公室派遣「人道、穩定暨重建小組」(Humanitarian, Sta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ams) 到國防部的各地區作戰司令部(Regional Combatant Commands)，參與各地區的後衝突作戰行動重建規劃，並在師旅級部隊部署「前進文人小組」(Advance Civilian Teams) 協調相關事務(Buss 2005)。「國務院重建暨穩定協調官辦公室」與「文職後備軍人團」及相關小組都將有助於建立美國政府規劃與執行戰時保護文化場所的能力。2004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伊拉克文化骨董緊急保護法案」(the Emergency Protection for Iraqi Cultural Antiquities Act of 2004) 授權總統制定限制任何文化物品從伊拉克輸入美國，12月，小布希總統簽署法案生效(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6, 14)。美國政府積極這些建立文化資產保護制度，也與2005年1月15日的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新聞報導有關，報導指出考古學家發現美軍與波蘭軍隊在2003年4月伊拉克戰爭後，於巴比倫古城建立軍事基地，已對古城城牆及建築造成嚴重破壞(The Guardian 2005)。伊拉克文化部長要求聯合國進行調查及修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集專家學者遂進行長達三年多(2005~2009)的調查，

確認美軍與波軍對當地文化遺產造成嚴重的損害（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aveguarding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raq 2009）。2006年，美國民間成立藍盾委員會也是在回應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文化資產遭掠奪偷竊及軍事基地建設損及文化遺產的國內外批評。

美國開始思考批准「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從國際公約、國會議員提出伊拉克文化資產保護法案，而到行政部門找出適用於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之國內法律（Elsea and Garcia 2004）。在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及「國家歷史保存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第402條規定下，國防部作戰規劃者及部署的軍人必須考量出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清單上的文化資產，以及等同於美國「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的當地國家史蹟名錄所列的文化資產（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19）。

因為美國未能防止2003年伊拉克國家博物館災難，遂引起國內外輿論批評，也促使有關軍隊整合文化資產保護考量納入其作戰規劃的問題及討論，進而制訂出相關的組織、準則、訓練與作為。例如國防部就資助經費與克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合作設置網站提供文化資產保護訓練及相關資源，涵蓋相關的公約、法律及軍事準則資源，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及埃及等三國的文化資產（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Military Land,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2005年起，美國「國防部傳承資源管理計畫」（DoD Legacy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就資助「戰場文化遺產認知訓練計畫」（In-Theater Cultural Heritage Awareness Planning and Training Program）辦理強化所屬官兵及人員的文化認知能力，2008年由中央作戰司令部成立「中央作戰司令部歷史文化諮詢組」（CENTCOM Historical-Cultural Advisory Group）負責規劃與訓練，2009年改名「中央作戰司令部歷史文化行動組」（CENTCOM Historical-Cultural Action Group），2011年改名「作戰司令部文化遺產行動組」（the Combatant Command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²⁰ 負責美軍及協助盟軍相關的訓練（Rush 2010a, 86-97; Rush

²⁰ 此單位是由有關文化資產領域的民間學者、非政府組織人員、各軍種代表及國防部文

2010b, 98-107)。除此之外，中央作戰司令部已經以完整的第200-2號規定（regulation 200-2）釐清歷史文化要求，為應變作戰行動發展出作戰行動環境規定，包括以流程圖型式呈現的清單，作為在考古敏感地區地面作戰處理古文化資產議題的指導綱領（CEMML 2017）。

2006年由學者及美軍退役的民事工作軍官組成「美國藍盾委員會」（U. S. Committee of Blue Shield），依據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提升美國國內法律對文化資產的保護，協調美國政府部門與軍隊及民間文化遺產組織促進武裝衝突期間的文化資產保護，以及建立相關的資料庫（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c）。2007年白宮給國會的「條約優先順序表」（The Treaty Priority List）中，就表達了請求國會支持批准條約，包括「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提出批准此公約（Jackson 2008, 47）。2008年9月25日，美國參議院批准通過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2009年3月13日，才完成簽署及送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Verner 2011）。2016年國會通過「國際文化資產保護與保存法」（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perty Act of 2016）要求總統在2016年8月前頒布命令禁止敘利亞文物進口（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6, 14）。

美軍為使官兵在戰場上了解文化資產及遺產保護的重要性，除了加強相關訓練外，並由「作戰司令部文化遺產行動組」（the Combatant Command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編寫兩本手冊以完善建置的軍事作戰行動概念連結文化資產保護概念，一本是《文化礦場：前進操作者的文化資產保護手冊》（*The Cultural Minefield: A Manual on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the Operator Forward*）及《駐紮環境內的文化資產保護手冊》（*A Manual for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Deployed Environment*）（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 2012a; 2012b）。「作戰司令部文化遺產行動組」也和考古學家Laurie W. Rush合作將戰區內的文化資產訊息及照片印製成撲克牌卡片及海報，發給訓練官兵落實保護文化資產的接戰準則（Zeidler and Rush

職人員所組成，協助美軍各作戰司令部及聯合參謀本部規劃與訓練，強化官兵對文化資產保護的認知與能力。

2010; Mills and Rush 2017, 111)。美軍現行編號GTA 41-01-002的「民事工作藝術、紀念碑與文獻檔案指導綱要」(Civil Affairs Arts, Monuments, and Archives Guide)是最新版本,是美軍處理戰場上文化資產保護的作業依據準則(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9)。各軍種也有關的準則、教範與手冊,指導官兵在戰時依據規定遂行保護文化資產任務(Thurlow 2005)。美國陸軍工兵署的工兵研發中心(Engine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正在為駐外基地美軍官兵研發文化資產保護的資料庫及工具,以利建立禁止攻擊的文物場址清單及協助地面作戰(Fay and Calfas 2017)。也積極將文化資產保護任務納入其與盟軍演習的重要項目或是主題,協助盟軍建立相關制度與能力,共同遂行保護文化資產的任務(Rush and Hemmingsen 2018)。簡言之,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之後學得深刻的教訓,不僅簽署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更積極制定相關軍事準則及手冊,以及加強軍人訓練,還有強化軍文機構的協調,企圖建立完整的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制度。例如2016年9月,美軍負責軍民作戰行動(civil-military operation)的聯九(G-9)與第10山地師及文化資源處(Cultural Resource Branch)就進行「山頂17-02演習」(Mountain Peak 17-02),強化軍文單位在作戰行動中文化資產保護的協調與合作(Mills and Rush 2017)。

二、歐洲國家政府與軍隊

上述戰爭期間的破壞文化資產事件也促使歐洲若干國家的國防部頒布指令要求軍隊重視保護與尊重文化資產。例如奧地利國防部特別頒布「軍隊保護文化資產與文化遺產」的指令(Directives for the Military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Military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Austrian),規範軍隊對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性及相關職責與作業規定,其中指令第3條規定了軍隊對文化資產保護的特殊義務:確保文化資產、尊重文化資產(不作為軍事目的使用、不採取敵對行動、審慎考量迫切的軍事必要性、基於人道使用)、禁止不法的行動(任何形態的竊盜,搶奪,掠奪,或其他非法挪用、過失或故意毀損此類資產,針對文化資產的報復性手段、任何不正當運送,或其他形式移動,或所有權轉移)(Austr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09)。

基於1990年代起，阿富汗、伊拉克、馬利等多場武裝衝突中發生文化資產遭受破壞，以及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各國需要團結分擔保護文化資產此共同責任，法國陸軍於2014年6月制定《武裝衝突事件中文化資產保護手冊》（*Handbook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作為其軍種準則（EMP 50.655），協助官兵了解相關國際法及法國國內法的規定（Centre de Doctrine d'Emploi des Forces 2015）。義大利國防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簽署協議於2016年2月16日成立「文化的藍盔部隊」（The Blue Hamlet of Culture）或是「保護文化遺產憲兵隊」（the Carabinieri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為文化遺產團結專案小組」（Unite4 Heritage Task Force）²¹ 確保在國際任務中文化資產安全及反制文化資產非法走私買賣（Ministry of Defense 2016）。德國於2007年批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防止文化資產擁有權非法輸入、輸出及移轉條約」，歷經多年評估及研究，2016年8月依據國際法及歐盟相關法律修訂及通過其文化資產保護相關法令，不僅保護國內的文化資產，也保護他國的文化資產，包括禁止非法輸出入及移轉文化資產（Federal Government Commissioner for Culture and the Media 2016）。

史東和貝杰立（Peter G. Stone and Joanne Farchakh Bajjaly）合編的《伊拉克文化資產的毀滅》（*The Destructions of Cultural Property of Iraq*）提供了英國軍隊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與經驗（Stone and Bajjaly 2008）。史東是位考古學者，2003年2月2日，在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之前的二個月，英國國防部就請他提供伊拉克建築文化遺產所在名單，他並提醒英國要重視1954年文化資產保護公約的要求（Stone 2013）。但英國當時並未簽署1954年文化資產保護公約，也造成英國在伊拉克進行相關文化資產保護行動的限制（The Guardian 2015a）。英國三軍更在2016年11月開始招募文化資產專家組成專業單位，負責戰時文化資產保護相關業務（The Art Newspaper 2016）。直至2017年9月12日，英國國會批准簽署「2017年文化資產（武裝衝

²¹ 「為文化團結」（Unite4 Heritag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的弘揚及保護全球文化遺產和多樣性的活動，以反對極端主義和激進份子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破壞及毀滅。

突)法」(The Cultural Property (Armed Conflicts) Act 2017)，12月12日以此國內法施行1954年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其中第5條(Section 5)規範指揮官及上級長官的責任(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17)。

從法國制定軍事準則、奧地利國防部的指令、義大利國防部成立專責小組及英國簽署1954年海牙公約來看，清楚地說明了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尤其是歐洲國家歷經戰爭及文化資產豐富的經驗，例如英國及德國在帝國殖民時期擄獲掠奪其他國家的文化資產，隨著國際社會保護人類文化資產觀念改變，歐洲國家軍隊已經不再是以往掠奪者的角色，而成爲保護者的角色。在伊拉克戰爭之後，更彰顯出歐洲國家軍隊致力於加強與健全此保護者的角色與能力。

三、聯合國與「北約組織」

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失竊事件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緊急邀集專家學者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組成「國際刑警組織伊拉克失竊文化資產專案小組」(Interpol Task Force for the Tracking of Iraqi Stolen Cultural Property)，前往伊拉克調查(Gerstenblith 2006, 28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6年出版《文化資產保護(軍隊手冊)》(*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Military Manual*)，作爲各會員國軍隊在武裝衝突中執行國際保護文化資產法律的指導(O'Keefe et al. 2016)。《手冊》指出軍隊在武裝衝突中保護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包括抽象的重要性(保留文化資產是人類福祉與繁榮的根本)、戰略的重要性(軍隊依法保護文化資產可以是有效戰略溝通的一部分，維護軍隊形象，有助爭取當地民心)及法律的重要性(軍隊保護文化資產是該國家的國際法律責任)(O'Keefe et al. 2016, 1-2)。2017年3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無異議通過第2347號決議，譴責恐怖分子團體毀壞及走私文化資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武裝衝突事件文化資產保護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CPCPEAC)於2017年11月29-30日的第12次會議決議通過由「國際博物館協會」代表「國際藍盾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及行動計劃，作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化武裝衝突事件文化多元主義保護行動戰

略」(Strategy for the Reinforcement of UNESCO's A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的一部分，行動計劃中對於軍隊提出建立文化資產保護能力及提升文化資產保護認知，包括訓練教材、納入維和行動訓練及過程、教官訓練計畫，以及組織高階軍官代表會議討論相關有效策略(CPCPEAC 2017, 30-33)。

「北約組織」身為國際軍事組織自有國際法律義務保護文化資產，並在歷年各武裝衝突期間善盡此義務(Rawan 2017)。「北約組織」於2014年起每年召開「北約組織領導軍事行動中文化資產保護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 for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NATO-led Military Operations)研討會，以增加會員國與夥伴之間合作及對話，以及提出強化文化資產保護的改善建議(Rosen 2017)。「北約組織」與荷蘭「軍民合作卓越研究中心」(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 Centre of Excellence)共同合作以阿富汗戰爭為經驗，強調軍民合作在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性(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 Centre of Excellence 2015)。「北約組織」的法律事務司(Office of Legal Affairs)2017年9月出版的*NATO Legal Gazette*期刊就以專刊方式邀集專家學者探討文化資產保護議題，包括北約將文化資產保護整合於其環境保護政策(Burbridge 2017)、武裝衝突前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訓練及衝突後的保護文化及提升文化多元主義的責任(Hladik 2017)、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判決毀壞文化資產罪犯(O'Keefe 2017; Vlastic and Turku 2017)、伊斯蘭國以毀壞文化資產作為恐怖工具及財務方法(Turku 2017b)、文化資產保護相關的軍事訓練及經驗(Gerstenblith and Wilkie 2017; Rush 2017)等等。彰顯出戰爭期間所出現的摧毀當地古文化資產事件促使歐美國家增強其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不僅強化官兵相關的教育訓練，也增加相關的軍事準則與教範。例如「北約組織」於2012年出版「作戰行動規劃過程中的文化資產保護」(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Operations Planning Process)，就2011年在利比亞的「聯合保護者作戰行動」(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中有關文化資產保護的得失，提出檢討與改善建議，尤其在作戰行動規劃過程中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有效地避免空襲時造成對文化資產的損害(NATO 2012)。自2014年起，「北約組織」每年舉行「北約領導的軍事作戰行動中文化資產保

護最佳時實踐」一系列的工作坊，例如「高階研究作坊」（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s），增強各國與國際組織在軍事作戰行動中遂行文化資產保護任務的能力，以及增修訂相關政策與準則（Rosen 2017）。2016年「北約組織」出版《作為兵力增強器的文化資產保護：各階段的執行》（*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a Force Multiplier: Implementation for All Phases*）一書，強調文化資產在戰時及平時各項行動階段的重要性（Rush 2016）。

總之，武裝衝突期間文化資產受到損毀是不可避免的，保護文化資產議題遂已是與任務相關的優先議題（Cunliffe, Fox and Stone 2018），文化資產保護已經成為軍隊在遂行軍事任務時的新議題，無論在軍事教育訓練或作戰規劃時，都要納入思考文化資產保護，以尋求作戰任務成功與文化資產保護之間的平衡。

陸、結論

在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尊重與保護人類文化資產是崇高的國際法規範，軍隊或交戰團體不僅要防止毀壞文化資產，更應該積極制止及懲罰這類罪行。因為人類的文化資產在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遭致不論是參戰的國家或團體，乃至恐怖團體（例如伊斯蘭國）蓄意或過失的重大破壞與毀滅，是對人類文化的大屠殺及滅絕。即使國際法禁止也懲罰這樣的罪行，但國際法的規範仍然必須建立在國際政治的現實基礎之上，國際社會能否依據國際法規範在戰爭期間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端賴國際政治強國能否展現實力防止與制裁毀滅人類文化資產的國家或團體。尤其是強國軍隊尊重與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角色尤為重要，本身不僅要遵守國際法的規範，更要防止與制裁違反國際法規範的國家及團體。但強國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並不必然立即服從國際法規範，令其軍隊擔負起保護文化資產的責任，除非國際社會環境（尤其國際輿論）要求其履行強國責任，但這都彰顯出歐美軍隊在武裝期間保護文化資產的重要角色。

誠如上述2003年伊拉克戰爭，即使之前，美國民間機構（藍盾委員會）與政府部門（國務院與國防部）已經規劃及準備相關保護當地文化資產的措施。仍然發生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引發國際社會譁然，批評美國及其盟國未能

善盡保護文化資產的責任。尤其美軍與波蘭軍隊於巴比倫古城建立軍事基地，經伊拉克訴請聯合國調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報告確認美軍與波軍對當地文化遺產造成嚴重的損害。美國民間遂成立藍盾委員會及美國政府思考批准「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直到2008年9月，參議院才批准，2009年3月，總統才簽署送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皆是回應國內外的批評，也促使聯合國與歐美國家及其軍隊建立相關政策及準則。乃至英國國會也是要到2017年9月批准簽署「1954年海牙文化資產保護公約」，12月施行。彰顯出英美強國並非基於國際法律保護文化資產的義務與責任，而是國際社會環境（尤其是國際輿論）或國際政治的現實（例如佔領治理伊拉克）所致。

2014年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進行叛亂，蓄意摧毀當地古文明的文化資產，即使遭致國際社會嚴厲譴責，美國及其盟軍撤離，以及受限於敘利亞及伊拉克軍隊能力，也無法阻止這類事件繼續發生。隨著美國援助伊拉克軍隊及俄羅斯援助敘利亞軍隊，伊斯蘭國逐漸衰落，伊敘兩國軍隊可望收復失土。但當地文化資產已經遭受嚴重損害，除了需要國際社會協助修復外，更需要英美強國軍隊平定戰亂，協助依據國際法將摧毀文化資產的伊斯蘭國領導者及成員送交國際刑事法院或伊拉克、敘利亞國內法院予以起訴審判，以防止及嚇阻日後再度發生這類的人類文化資產浩劫。

2003年伊拉克戰爭促使國際社會強調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與功能，此角色與功能已是軍隊的國際法責任及義務，即使面對非國家的武裝團體，軍隊仍必須擔負此責任及義務。國際組織與各國正逐漸強化軍隊在此方面的訓練及能力，務求在戰爭衝突期間實踐及善盡其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與功能。

（收件：107年6月29日，接受：108年8月14日）

The Military's Roles and Practices of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during Armed Conflicts: The Effects of the Iraq War (2003-2011)

Hsueh Chen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CPP) during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ith armed forces having obligations to protect cultural property from Law of Wa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Law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wer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have been played by great powers (particularly United States) in wars or armed conflic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American military and its alliance failed to protect cultural property during Iraq War (2003), despite the U.S. has planned to protect before the War began. Following the dilemma of Monastery of the Archangel (2004), the destruction of spiral Minaret al-Malwiya at Samarra (2005), and the mass destruction of Islamic State (2014-2015), it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rol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ilitaries in CPP using these cases. Furthermore, to explore the reformations of CPP, related policies and doctrines of United Nations, NATO and Occidental States will be examined.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 the first section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in relation to the the military's roles in CPP to illustrate the empowered roles played by laws; the second

section describes America's planned CPP progr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Iraq War (2003),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CPP preparation done by Americans before the war and to show the influence of looting at the Iraq National Museum on CCP; the third section takes three cases following the Iraq War as examples for exploring the military's critical roles in CCP; the fourth section explores the policy and doctrinal measures of CCP that was reformat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 and NATO) and Occidental States after the War for strengthening the roles, awareness and capabilities of armed forces. All these issues will demonstrate the military's critical roles of the CPP in planning, preventing and correcting cultural criminals of War.

Keywords: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Law of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參考文獻

- 王怡，2005，〈論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安理會的關係〉，《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3(2): 207-212。Wang, Yi. 2005. “Lun guo ji xing shi fa yuan yu lian he guo an li hui de guan x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UN Security Counci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3(2): 207-212.
- 王保鍵，2015，〈混合法庭：國際刑法制度中追訴嚴重犯罪的新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3)：507-546。Wang, Pao-chien. 2015. “Hun he fa ting: guo ji xing fa zhi du zhong zhui su yan zhong fan zui de xin mo shi” [Hybrid Courts: New Forms of Prosecuting Serious Crim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7(3): 507-546.
- 林雍昇，2005，〈從國際刑法的發軔到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兼述羅馬規約的主要內容〉，《台灣國際法季刊》，2(2): 281-307。Lin, Long-sheng. 2005. “Cong guo ji xing fa de fa ren dao guo ji xing shi fa yuan de cheng li-jian shu luo ma gui yue de zhu yao nei rong”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2(2): 281-307.
- 孫國祥，2002，〈國際刑事法院未來成效之探討：多一點法律少一點政治？〉，《問題與研究》，14(1): 105-123。Sun, Kuo-shyang. 2002. “Guo ji xing shi fa yuan wei lai cheng xiao zhi tan tao: duo yi dian fa lu shao yi dian zheng zhi?” [The Futur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ore Justice and Less Politics?]. *Wenti Yu Yanjiu*, 14(1): 105-123.
- 陳榮傳，2001，〈由國際法觀點論武裝衝突事件中文化資產之保護〉，丘宏達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國際法論集：丘宏達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495-503，台北：三民。Chen, Rong-chwqn. 2001. “You guo ji fa guan dian lun wu zhuang chong tu shi jian zhong wen hua zi chan zhi bao hu” [On the Protections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Armed

Conflict Events: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In The Board of Editors for Professor Hungdah Chiu 65th Birthday Greeting Papers, ed., “Guo ji fa lun ji : qiu hong da jiao shou liu zhi jin wu hua dan zhu shou lun wen ji” [International Law Papers: Professor Hungdah Chiu 65th Birthday Greeting Papers], pp.495-503. Taipei: Sanmin.

陳榮傳，2002，〈由國際私法觀點論盜賊文化資產之回復問題〉，《東吳法律學報》14(1): 67-128。Chen, Rong-chwqn. 2002. “You guo ji si fa guan dian lun dao zang wen hua zi chan zhi hui fu wen ti” [Restitution of Stolen Cultural Properties: A Conflict-of-laws Perspective]. *Soochow Law Review*, 14(1): 67-128.

葉錦鴻、林正順，2007，〈恐怖組織的戰爭法適用問題〉，《高大法學論叢》，3(1): 1-31。Yeh, Chin-hung and Cheng-shung Lin. 2007. “[Kong bu zu zhi de zhan zheng fa shi yong wen ti” [The Application of Law of War fo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3(1): 1-31.

Alcala, Ronald T.P. 2015. “Babylon Revisited: Reestablishing a Corps of Specialis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Armed Conflict.” *Harvard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6(1): 206-254.

Alderman, Kimberly L. 2013. “The Human Right to Cultural Property.” *Michiga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1): 69-81.

Anderson, Maxwell L., and Ashton Hawkins. 2002. “Preserving Iraq’s Past.”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Arimatsu, Louise, and Mohbuba Choudhury. 2015.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Syria and Iraq.”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91: 641-968.

Arndt, Richard. 2005.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Austr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09. *Directive for the Military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Military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Vienna,

- Austria: Austrian Ministry of Defence.
- BBC News. 2017. "Battle of Mosul: Iraq PM Abadi Formally Declares Victory."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0558836> (October 2, 2017).
- Bejesky, Robert. 2015. "A Theorization on Equity: Tracing Causal Responsibility for Missing Iraqi Antiquities and Piercing Official Immunity."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7(2): 397-468.
- Bogdanos, Matthew. 2005. *Thieves of Baghdad: A Marine's Passion f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the Journey to Recover the World's Greatest Stolen Treasures*. New York, NY: Bloomsbury Publishing.
- Bogdanos, Matthew. 2007. "Fight for Iraq's Culture." <https://www.nytimes.com/2007/03/06/opinion/06bogdanos.html>(October 2, 2017).
- Bogdanos, Matthew. 2008. "Thieves of Baghdad." In Peter. G. Stone and Joanne Farchakh Bajjaly, eds.,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Iraq*, pp.109-134. Woodbridge, Canada: Boydell.
- Bokova, Irina. 2015. "Culture on the Front Line of New War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2(1): 289-296.
- Bouckaert, Peter. 2004. "Failure to Protect: Anti-Minority Violence in Kosovo, March 2004."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kosovo0704.pdf>(October 2, 2017).
- Brosché, Johan, Mattias Legné, Joakim Kreutz, and Akram Ijla. 2017. "Heritage Under Attack: Motives for Targeting Cultural Property During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3(3): 48-260.
- Burbridge, David J. 2017.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o NA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An Example of Good Practice." *NATO Legal Gazette*, 28: 8-18.
- Buss, John C. 2005. "The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SL Issue Paper*, 09-05.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36010.pdf>. (July 11, 2019).

- CEMML. 2017. "Environmental Quality CENTCOM Contingency Environmental Guidance." http://www.cemml.colostate.edu/cultural/09476/pdf/CENTCOM_ITTR_CCR_200-2-1.pdf. (September 24, 2017).
- Center for Law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2004. *Legal Lessons Learned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q, Vol.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11 September 2001-1 May 2003)*. Charlottesville, VA: Center for Law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Military Land,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Cultural Property Training Resources." <https://www.cemml.colostate.edu/cultural/09476/iraqstart.html> (July 11, 2019).
- Centre de Doctrine d'Emploi des Forces. 2015. *Handbook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Paris, French: Centre de Doctrine d'Emploi des Forces.
- 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 Centre of Excellence. 2015.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kes Sense: A Way to Improve Your Mission*. Hague, Netherlands: 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 Centre of Excellence.
- Cogbill, James B. 2008. "Protection of Arts and Antiquities During Wartime: Examining the past and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Military Review*, 88(1): 31-32.
- 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 2012a. *The Cultural Minefield: A Manual on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the Operator Forward*. Fort Drum, NY: 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
- 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 2012b. *A Manual for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Deployed Environment*. Fort Drum, NY: 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
- Corn, Geoffery S. 2005. "'Snipers in the Minaret-What is the Rule?' The Law of War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 Complex Equation." *Army Lawyer*, 386: 28-40.
- CPCPEAC. 2017. "Report on the Blue Shield on the Situations Where Cultural Property Is at Risk in the Context of an Armed Conflict, Including Occupatio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6/002601/260141e.pdf> (December 18, 2017).

Cunliffe, Emma. 2012. "Damage to the Soul: Syria's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flict." http://ghn.globalheritagefund.com/uploads/documents/document_2107.pdf (August 8, 2017).

Cunliffe, Emma, Paul Fox, and Peter Stone. 2018.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Unnecessary Distraction of Mission-Relevant Priority?" *NATO OPEN Publications*, 21(4): 1-22.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9. "Civil Affairs Arts, Monuments, and Archives Guide." <http://cchag.org/wp-content/uploads/2014/02/GTA41-01-002.pdf> (August 18, 20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struction 3000.05. Stability Operations." <https://www.esd.whs.mil/Portals/54/Documents/DD/issuances/dodi/300005p.pdf>. (December 26, 2017).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17.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Its Protocols and the Cultural Property (Armed Conflicts) Act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61733/Guidance_on_implementation_of_the_Convention_-_final.pdf. (December 26, 2017).

Elsea, Jennifer K., and John Garcia. 2004. "Cultur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United States Legislation (RL32351)."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pril 8.

Farrior, Stephanie. 2007. "Introductory Note to Behrami v. France, and Saramati v. France, Germany and Norway European Court Grand Chamber."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46(4): 473-475.

Fay, Kathryn O., and George W. Calfas. 2017. "Heritage at Risk: Mapping as a Form of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for Global Heritages Sites." *NATO Legal*

Gazette, 28: 92-99.

Federal Government Commissioner for Culture and the Media. 2016. *Key Aspects of the New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Germany* Berlin, GER: Federal Government Commissioner for Culture and the Media.

Foradori, Paolo, Serena Giusti and Giovanni Lamonica. 2018. "Reshap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olicies at a Time of Securitisatio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3(3): 86-101.

Francioni, Francesco. 2011. "The Human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 An Int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1): 9-16.

Francioni, Francesco, and Federico Lenzerini. 2003. "The Destruction of Buddhas of Bamiy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4): 619-651.

Gerstenblith, Patty. 2006. "From Bamiyan to Baghdad: Warfar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7(2): 245-352.

Gerstenblith, Patty. 2016.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 Crime Against Property or A Crime Against People?" *The John Marshall 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15(3): 336-393.

Gerstenblith, Patty, and Nancy Wilkie. 2017. "The 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and the Blue Shield Movement." *NATO Legal Gazette*, 28: 70-79.

Hartt, Frederick. 1949. *Florentine Art under F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ctor, Mirielle. 2010. "Enhancing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Offences Involving Cultural Property-The Road to Rome Statute and the 1999 Second Protocol." In Nout van Woudenberg and Liesbeth Lijnzaad, eds.,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Armed Conflict: An Insight into the 1999 Second Protocol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54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pp. 69-76. Leiden,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He, Hannah G. 2015. "Protecting Ancient Heritage in Armed Conflict: New Rules for Targeting Cultural Property During Conflict with ISIS."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1): 168-190.
- Hladik, Jan. 2017. "Presenting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n Armed Conflict and Its 1999 Second Protocol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Peacetime Responsibilities." *NATO Legal Gazette*, 28: 28-39.
- ICRC. 2013.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https://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ihl_and_ihrl.pdf(November 15, 2017).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2017. "The Cases." <http://www.icty.org/cases/party/786/4>(August 24, 2017).
-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aveguarding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raq. 2009. *Final Report on Damage Assessment in Babylon*. Paris, French: UNESCO.
- Jackson, Dick. 2008.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Stability Operations." *Army Lawyer* 425: 47-57.
- Jehl, Douglas, and Elizabeth Becker. 2003. "Experts' Pleas to Pentagon Didn't Save Museum."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 Johnson, John C. 2006. "Under New Management: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Cultural Property During Military Occupation." *Military Law Review*, 190/191 (2006/2007): 111-152.
- Jakubowski, Andrzej. 2015. *State Succession in Cultural Proper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yaraman, Shiva. 2017.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Prosecutor v. Al Mahdi." 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international_immersion_program_papers/50(November 15, 2017).
- Kila, Joris D. 2012. *Heritage Under Siege: Military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 Property Protection Following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Boston, MA: Brill.
- Kila, Joris D. 2013.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Part of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In Joris D. Kila and James A. Zeidler, eds., *Cultural Heritage in Crosshairs: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During Conflict*, pp. 9-50. Boston, MA: Brill.
- Kila, Joris D., and Christopher V. Herndon. 2014.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Joint Forces Quarterly*, 74(3): 116-123.
- Lambourne, Nicola. 2001. *War Damage in Western Europe: 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Lawler, Andrew. 2003. "Mayhem in Mesopotamia." *Science Magazine*, August 1.
- Loughlin, Sean. 2003. "Rumsfeld on Looting in Iraq: 'Stuff Happens'." <http://edition.cnn.com/2003/US/04/11/sprj.irq.pentagon/> (October 12, 2017).
- MailOnline. 2017. "ISIS Destruction Popular Mosque Prophet Jonah."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166894/ISIS-destruction-popular-Mosque-prophet-Jonah.html> (October 12, 2017).
- Martin, Paul, Ed Vulliamy, and Gary Hinsliff. 2003. "U.S. Army Was Told to Protect Looted Museum."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3/apr/20/internationaleducationnews.iraq>(October 12, 2017).
- Merryman, John Henry, Albert Edward Elsen, and Steven K. Urice. 2007. *Law, Ethics, and the Visual Art*. Alphen aan den Rij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Mills, Kristoffer T., and Laurie Rush. 2017.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o a Decisive Action Training Exercise." *Military Review*, 97(6): 106-116.
-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 "The Blue Helmets of Culture: Task Force 'Unite4 Heritage' Established." https://www.difesa.it/EN/Primo_Piano/Pagine/blu.aspx (December 12, 2017).
- National Archives. 2017. "Records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 (The Roberts Commission), 1943-1946 (RG 239).”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holocaust/finding-aid/civilian/rg-239.html#14> (August 24, 2017).

NATO. 2012.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Operations Planning Process*. Lisbon, Portugal: NATO Joint Analysis and Lessons Learned Centre.

Nyheter, Dagens 2007. “To Defend the Monastery in Prizren.” <http://europenews.dk/en/node/127> (October 2, 2017).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Law of War Manual*.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Keefe, Roger, Camille Péron, Tofiq Musayev, Gianluca Ferrari. 2016.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Military Manual*. Paris, Franc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Keefe, Roger. 2017.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War Crimes.” *NATO Legal Gazette*, 28: 40-49.

Pauwels, Annelies. 2015. “ISIS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Property: Funding Terrorism Through Art.” *Freedom From Fear Magazine*, 11: 64-70.

Polgreen, Lydia. 2013. “As Extremists Invaded, Timbuktu Hid Artifacts of a Golden Age.” <http://www.nytimes.com/2013/02/04/world/africa/saving-timbuktus-priceless-artifacts-from-militants-clutches.html> (August 8, 2017).

Quigley, Kelsey. 2015. “ISIS’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Treasures: Reason for Education and Legal Enforcement.” <http://berkeleytravaux.com/isis-destruction-cultural-treasures-reason-education-legal-enforcement/> (November 15, 2017).

Rawan, Zarghoen. 2017. “Great, Greatest or Outstanding: Defin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NATO Operational Context.” *NATO Legal Gazette*, 38: 100-114.

Rosen, Frederik. 2017. “NATO-led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NATO Legal Gazette*, 38: 19-27.

Rothfield, Lawrence. ed. 2008. *Antiquities Under Sieg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fter the Iraq War*.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 Rush, Laurie W. 2010a. “Dealing the Heritage Hand: Establishing 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gram for Global Operations.” In Laurie W. Rush, ed., *Archeology,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Military*, pp. 86-97. Rochester, NY: The Boydell Press.
- Rush, Laurie W. 2010b. “Teaching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entral Command Historical/Cultural Advisory Group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In Laurie W. Rush, ed., *Archeology,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Military*, pp. 98-107. Rochester, NY: The Boydell Press.
- Rush, Laurie W. 2012.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a Force Multiplier in Stability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92(2): 36-43.
- Rush, Laurie W., ed. 2016.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a Force Multiplier: Implementation for All Phases*. Brussel, Belgium: NATO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ject.
- Rush, Laurie W. 2017. “The Importance of Training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 Example from the U.S. Army.” *NATO Legal Gazette*, 28: 80-91.
- Rush, Laurie W., and Amanda Hemmingsen. 2018. “Partner of Choice: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Military Engagement.” *Military Review*, 98(6): 102-119.
- Sandholtz, Wayne. 2005. “The Iraqi National Museu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Duty to Protect.”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4(1): 185-240.
- Sandholtz, Wayne. 2007. *Prohibiting Plunder : How Norms Chan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airer, Suzanne L. 2001. “The Intersec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Proper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t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1(1): 59-99.
- Serbenco, Par Eduard. 2005.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nd Post-Conflict Kosovo.” *Revue québéco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8(2): 91-125.
- Sivakumaran, Sandesh. 2011. “Re-envisag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1): 219-264.
- Stone, Peter G., and Joanne Farchakh Bajjaly, eds. 2008. *The Destruct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Iraq.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Stone, Peter. 2013. "War and Heritage: Using Inventory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http://www.getty.edu/conservation/publications_resources/newsletters/28_2/war_heritage.html(November 12, 2017).

The Art Newspaper. 2016. "Modern-day Monuments Men Wanted by the British Army." <http://theartnewspaper.com/news/modern-day-monuments-men-wanted-by-the-british-army/> (November 12, 2017).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Committees of the Blue Shield. 2018. "About Us." <http://www.ancbs.org/cms/en/about-us/about-ancbs> (June 12, 2018).

The Guardian. 2005. "Babylon Wrecked by War: US-led Forces Leave a Trail of Destruction and Contamination in Architectural Site of World Importan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jan/15/iraq.arts1>(August 30, 2018).

The Guardian. 2014. "Islamic State Destroys Ancient Mosul Mosque, the Third in a Week."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28/islamic-state-destroys-ancient-mosul-mosque>(August 24, 2017).

The Guardian. 2015a. "Peer Furious at UK 'Dithering' over Treaty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5/apr/18/lord-renfrew-iraq-nimrud-hague-isis-islamic-state>(November 24, 2017).

The Guardian. 2015b. "Isis blows up Arch of Triumph in 2, 000-year-old City of Palmyra."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oct/05/isis-blows-up-another-monument-in-2000-year-old-city-of-palmyra> (August 24, 2017).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8. "List of National Committees." <http://www.ancbs.org/cms/en/home2/blue-shield-national-committees/list-of-national-committees>(June 12, 2018).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19. "World Heritage List." <http://whc.unesco.org/en/list/> (July 11, 2019).

Thurlow, Matthew D. 2005.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Iraq: How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Comports with International Law." *Yale Human Rights &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8: 153-187.

- Turku, Helga. 2017a.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s A Weapon of War: ISIS in Syria and Iraq*.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urku, Helga. 2017b. "ISIS' Use of Cultural Property as a Tool for Terrorism and a Means to Finance It." *NATO Legal Gazette*, 28: 61-69.
- UN News Centre. 2015. "UNESCO welcomes re-opening of Iraq's National Museum in Baghdad."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0222#_Vn_bYhV94hc (November 24, 2017).
- UNESCO. 2019.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vention." <http://www.unesco.org/eri/la/convention.asp?KO=13637&language=E&order=alpha> (January 8, 2019).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15. "Resolution 2199(2015)." [https://undocs.org/S/RES/2199\(2015\)](https://undocs.org/S/RES/2199(2015)) (September 24, 2017).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6.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Iraqi and Syrian Antiquiti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 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a. "About Us." <https://www.uscbs.org/about-us.html> (January 8, 2019).
- 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b. "International Affiliates." <https://www.uscbs.org/international-affiliates.html> (January 8, 2019).
- U.S.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 2019c. "USCBS Mission." <http://uscbs.org/uscbs-mission.html> (January 8, 2019).
- U.S. Department of Army. 1956. *Field Manual 27-10,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rmy.
- Verner, Elizabeth. 2011. "The Art of Armed Conflicts: An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Requirements towards Cultural Property under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Creighton Law Review*, 44(4): 1185-1243.
- Vlasic, Mark V., and Helga Turku. 2017. "War Crim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Syria and Beyond." *NATO Legal Gazette*, 28: 50-60.

- Willis, Lindsay E. 2005. "Loot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 Legislation Sche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raq's Cultural Heritage."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34: 221-251.
- Workert, Katrin, and Candice M. Juby. 2011. "Protection of Iraqi Cultural Property Since the War 2003: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ail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5(1): 131-147.
- Woudenberg, Nout van, and Liesbeth Lijnzaad, eds. 2010.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Armed Conflict: An Insight into the 1999 Second Protocol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54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Boston, MA: Martinus Nijhoff.
- Zeidler, James, and Laurie W. Rush. 2010. "In-Theater Soldiers Training Through Cultural Heritage Playing Cards: 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xample." In Laurie W. Rush, ed., *Archeology,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Military*, pp. 73-85. Rochester, NY: The Boydell Press.